

朱永新 马国川◎著

重启教育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十八讲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朱永新 马国川◎著

重启教育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十八讲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启教育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十八讲 / 朱永新, 马国川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1
ISBN 978-7-108-04854-7

I. ①重… II. ①朱…②马… III. ①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 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2907 号

责任编辑 朱利国
装帧设计 张 婷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6.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00, 001—20, 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前 言

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非常突出：全国适龄儿童可以免费入学，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超过一半的高中毕业生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高等教育大众化率几乎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教育已经告别了供给短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教育现状的不满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加剧之势。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充斥媒体，教育几乎丧失了公信力。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的孩子被父母送到国外读书，人们“用脚投票”来表达对国内教育的不满和失望。

这种矛盾的现象非常令人费解，我们把它称为“中国教育之谜”。我们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努力破解这个谜团。

面对“中国教育之谜”，已有许多人试图给出解释。有的从教育本身探求根源，有的从教育之外寻找原因，众说纷纭，各有道理。我们则试图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考察教育制度的演变，梳理导致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探究解决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路径。

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是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为创造中华文明、维系国家统一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越到后来，这种制度的负面效应越明显。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下，传统教育制度开始逐步动摇，并最终在1905年伴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而彻底瓦解。尽管传统教育制度的终结不可避免，但由于采取的是激进的变革方式，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没有得到重

视和继承。

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逐步确立，涌现出了一批现代教育家，高等教育也培养了一大批大师级人才。不过，由于缺乏稳定的时代大环境，战乱频仍，国家动荡，教育发展并不稳定，尤其是教育普及水平有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被完全废除，建立了全新的教育体制。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中国教育制度主要是学习、模仿欧美的话，那么在1949年以后，学习的对象就转向了苏联。就像在经济领域模仿苏联的做法建立起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教育领域也模仿苏联，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这种新教育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包办教育，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府手里，长官意志支配一切，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教育发展规律得不到尊重。这种体制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重点学校制度、城乡二元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化等，都成为今天中国教育问题的制度根源。新的教育体制经历了“两起两落”：在“大跃进”中遭到了破坏，在六十年代初期得到恢复；在“文革”中又遭破坏，七十年代后期再次得到恢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因素不断生长，社会越来越活跃，但是教育改革相对滞后，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教育的发展，社会各界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984年中共中央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年后的198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客观总结了教育体制存在的各种弊病，第一次明确将教育体制改革作为教育的重点，教育改革随之开始。遗憾的是，这次改革仅仅进行了四年就基本终止了。而且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八十年代后期产生了供给短缺严重的“教育危机”。

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教育的重点转向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与“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也有利于推动这种发展，因为其优

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另外，九十年代由于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为经济改革目标，市场化改革的大力推进使得中国经济驶入了发展的“高速路”。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和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

教育的大发展解决了许多持续已久的困扰，如教育经费短缺、大学招生数量过少等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可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虽然教育改革多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一些地方和学校的草根变革也悄然进行，但教育体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革，总的来说没有形成浩荡之势。所以早已存在的一些教育矛盾依旧存在，而且随着其他矛盾的解决而凸现出来，包括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择校热的不降反升、应试竞争的高烧不退、学生课业负担的日益加重，都是社会反映强烈却解决乏力的突出问题。

目前，中国教育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教育公平问题，一个是教育品质（质量）问题。通过梳理这些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两大问题都与教育体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假如不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功夫，那么中国教育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教育也不可能赢得公信力。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要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重启改革，就像1985年那样，以教育体制为改革的重点，着力解决体制问题。

新世纪以来，教育改革作为具有全局性的一项社会事业，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面临的境况是一样的。由于各种因素制约，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改革进展不大，有些方面停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有倒退之势。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重启改革议程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顺应民意，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这本书从2013年4月份开始写作，当时社会各界正在围绕着如何深化改革展开热烈讨论。半年之后的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也向我们理想中的教育、向人民满意的教育发起了一次冲锋，对教育体制改革进行了整体部署。可以看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表述中，这一次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对立德树人、推进教育公平，对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都讲得非常清楚。教育接下去的改革路径，已经十分清晰。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改革行动纲领要付诸实践，还要付出巨大努力。对于教育改革来说，首先是要开展全民教育大讨论，形成改革共识，形成“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对教育的关注与理解程度。过去多年间，教育改革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社会没有形成对于改革的共识，在教育的思想、体系和方法上没有“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究竟应该把孩子们带向何方”、“究竟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等根本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许多改革刚刚开始就受多方掣肘，步履艰难而往往半途而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各方意见不一。

所以，有必要像当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开展一场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讨论，提升整个民族的教育素养，形成教育改革的全民共识，为接下去的行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推动全民教育大讨论，有助于教育改革共识的形成。

教育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推进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需要有勇气、有耐心，积极稳妥，还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与支持，需要劳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是一项漫长的、无法一蹴而就的改革，更是一场只争朝夕、势在必行的改革，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为中国教育改革上下求索，戮力而行！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讲 中国教育面临危机 1

第二讲 教育百年，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15

第三讲 三十年的曲折发展 29

第四讲 教育重建、改革尝试和教育危机 43

第五讲 快速发展与问题凸显 57

第六讲 学生负担为什么减不下来？ 71

第七讲 “择校热”背后的制度性力量 85

第八讲 大学为何成为问题？（上） 99

第九讲 大学为何成为问题？（下） 115

- 第十讲 求解“钱学森之问” 129
- 第十一讲 大学生就业，难在哪里？ 143
- 第十二讲 被忽略的“短板”：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 157
- 第十三讲 民办教育的困境 173
- 第十四讲 教育均衡化：公平像阳光不可或缺 189
- 第十五讲 考试不改，教育难兴 203
- 第十六讲 教育腐败根在何处？ 217
- 第十七讲 教育改革为何缺乏动力？ 231
- 第十八讲 重启教育改革 245
- 参考书目 259

第一讲 | 中国教育面临危机

马国川：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速度非常惊人：200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2008年，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真正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义务教育；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1984.63亿元，占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意味着该目标自1993年提出以来首次实现，也标志着从此告别了教育经费短缺的时代。

非常奇怪的是，在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国人对于教育的不满却在上升。全社会对于教育似乎出现了“集体失望”：一方面，人们对教育很不满意，批评抨击的声音一直不断；另一方面，人们又茫然无措，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对教育失去了信心。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了“用脚投票”，将孩子送到国外学习，而且留学越来越低龄化。

朱永新：这种矛盾的现象确实非常突出。从好的方面看，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我的父亲在江苏的一个小镇上从事了一辈子教育，所以我对当年教育寒酸的情况印象深刻。那时候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学条件非常艰苦，教学设施简陋，有的学校连课桌也没有，需要学生自己带桌椅。许多学生坐在地上，趴在泥凳、石凳上写字。上学要收取学杂费，一些孩子由于交不起那点少得可怜的学费而辍学。现在呢，从小学到初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不但不收学费，连书本费都是国家负担。至于教学条件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些学校的设施堪称豪华。

现在高考的录取率超过了70%，个别省市甚至超过了90%，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有大学可上。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回想三十多年前参加高考时，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全国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亲身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今昔对比，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在世界上都是不多见的，堪称奇迹。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相对于快速成长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教育的问题确实很多，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在义务教育阶段，尽管学校数量充足，可以保障每个学龄儿童有学可上。但是，城乡之间学校的差距非常大。虽然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70%以上，可是投入到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只有35%左右。教育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看到，城市小学里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应有尽有，而农村学校教学设施简陋，有的甚至缺乏起码的教学条件。城市学校体育场馆大得可以开运动会，一些农村学校却连一个篮球架都没有。硬件差距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差距就是教师队伍的质量。

马国川：西北师范大学王嘉毅教授牵头做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城乡教师差异明显。从学历方面看，农村小学教师的第一学历基本以中专和高中为主，大专学历的教师仅占14.5%。县城小学和地市小学教师的第一学历以中专为主，省城小学教师的第一学历基本是以大专为主；农村中学教师的第一学历以中专为主，县城中学和地市中学教师的第一学历水平基本以大专学历为主，省城中学教师的第一学历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从教师队伍的职称结构上看，省城小学教师的职称结构相对合理，地市与县城小学以小教一级为主，但是农村小学未评级的教师达到了54.8%。从教师所学专业与所任学科的差异看，农村学校教师所学的专业与任教学科不一致的情况比较普遍。农村小学教师有很大一部分毕业于非师范专业，所学专业五花八门，比如气象、

园艺和商业专业等。省城学校和县城以上学校这种情况较少。从教学研究开展的情况看，农村学校的骨干教师数量不足，教研活动难以开展。教师队伍中的这些差别，导致城乡教育质量差别很大。

朱永新：东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差别也很大。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再加上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经常出现“锦上添花”的倾向，导致东部与西部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一项的差距就超过3倍。由于投入不足，中西部教育在教育发展水平、“两基”普及、师资力量、校舍建设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方面都落后于东部。例如，2009年上海小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达到14792.6元，是贵州2302.56元的6.42倍。因此，西部地区的中小学在各方面都比东部地区差，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在体育设施、教学条件、师资配置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在西部的一些边远地区，很多农村小学的办公室没有电脑，教师的桌上仍像过去一样摆放着一本书、一本教参和一些零散堆放的粉笔头。

即使在同一座城市里，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尤其是所谓“重点校”和普通校之间，差别甚至远远超过东西部之间的差距。200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分为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政府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然而，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差距偏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切实地解决。一些地方虽然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重点中学的称号，但在招生方面倾向扶持政策没有根本性变化，某些学校还是一些不挂牌的重点中学。

马国川：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差距很惊人。根据2009年国家重点课题的调查，硬件设备、校舍方面，重点中学通常比普通学校优越三至五倍。软件师资方面，无论是师资学历构成、晋升高一级职称的比例，还是获得进修深造的机会，重点中学都要比普通中学优越得多，机会多得多。重点校获得的生均教育经费，往往会高出非重点校平均

20%以上。差距更大的是建设房屋、购买设备、培训师资等政府专项经费。这些专项经费普通中学是难以期盼的，基本为重点中学垄断。专项经费数额巨大，有时相当于一个学校全年经费的总和。在政府拨款以外，重点中学还拥有吸纳各方资金的强大功能。一些重点中学可以源源不断地收取共建单位的共建费以及家长的赞助费、择校费。大城市重点中学的硬件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公办学校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国内的大学。重点中学不仅享有资金上的巨大优势，还通过组织考试选拔、接受优秀生推荐等方法，把最好的生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最终，重点中学依靠资金实力和生源质量的双重扶持，获得了普通中学无法超越的优势。这样就形成了教育上的“马太效应”：好学校越来越好，差学校越来越差，鸿沟越来越大。

朱永新：义务教育的本意，不仅仅是国家为适龄儿童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而且要贯彻教育平等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入学机会平等和资源分配平等。也就是说，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无差别的个人入学机会平等原则和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平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平等精神。法律规定的平等教育机会，不但指学生教育起点入学机会的平等，也包括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平等和所享有的教育质量平等。保证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平等和教育质量平等，其实是保障受教育者教育过程平等和教育成功概率平等的基本条件。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说明，中国教育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也是社会各界对教育不满的主要原因。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小学生、初中生实行就近入学。但是由于不同学校间的巨大差别，父母为了让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争相将孩子送进重点学校，于是就产生了“择校”现象。“择校”现象既是对这种不平等的扭曲应对，更是教育不平等的集中体现。

马国川：在小学入学和“小升初”期间，“择校”广泛存在。每年开学之前，择校潮一浪高过一浪，大量“家底”集中准备，各类关系

全面启动，学生、父母、学校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出现“集体癫狂”。

据北京某报报道，为了“跨片”选择好学校，攀亲戚、买假房本等种种手法齐上阵。每年到知名小学报名的学生中，不合条件的“假户籍”在40%—50%左右。甚至有的父母在接受学校入户调查时，竟然找不到自己住在哪间房里。有的关系户把手里多余的名额转给别人，几经辗转，收取高达十万元的“中介费”。

小升初同样存在类似现象。2014年小升初前夕，南京规定，不允许跨区择校。但是在名校云集的鼓楼区，报名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些孩子根本不符合户口、实际居住地及房产证三个条件，但不少父母拿出了近期才办的离婚证，有的还是登记前一天才离的婚。他们都是的一方放弃婚后房产，带着孩子迁回住在名校学区房的父母家。

朱永新：如果生活中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总是造成一些人间悲喜剧，那么它肯定是不合理的。有关机构发布的《2014教育蓝皮书》显示，有56.06%的受访者中认为“幼升小”过程中，公办学校择校现象“非常严重”、“比较严重”。在评价“小升初”相应指标时，低满意度群体比例更增至74.64%。相应的，仅有4.29%受访者认为所在地区幼升小公办学校没有择校现象，而认为所在地区小升初公办学校没有择校现象的受访者比例低至2.17%。

在“择校”现象背后，是如火如荼的应试教育。因为择校费的高低有无与分数紧密相关，所以择校热加剧了应试教育造成的灾难。事实上，由于小升初的择校热，许多父母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督促学生为了择校而努力，各种奥数班、培训班、特长班应运而生，小学生无不疲于奔命，身心健康严重受损，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

马国川：素质教育提出了许多年，实际效果怎样呢？就以学生的身体素质为例，大量的调查报告均显示，中国学生的体质状况在持续下降。例如，《北京市2010年度健康白皮书》显示，北京市中小學生肥胖检出率为20.3%，比2009年上升4.0%。肥胖导致少年儿童早早患

上诸如脂肪肝、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等“成人病”。

与城市学生肥胖问题相比，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等问题更令人担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0 年对青海、云南、广西、宁夏四省部分农村寄宿制小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受调查的 1400 多个农村孩子中，每 100 个中就有近 12 个生长迟缓，身高低于同龄城市孩子 6—15 厘米，还有 9 个体重低于同龄城市孩子约 7—15 公斤。营养不良给农村中小学生在期间的学习成绩以及日后的成就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中小学生的近视率也令人惊讶。如今，校园里的“小眼镜”到处都是。2010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口近视发生率为 33%，全国近视眼人数已近四亿，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近视眼人数居世界第一。中国近视高发群体是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 50%—60%。

朱永新：缺乏睡眠、缺乏体育锻炼是导致中小學生体质下降、近视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最苦的、睡眠最少的是中小學生，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1 年一项名为“中小學生睡眠时间”问卷调查发现，近一半孩子每天 22 点之后才能睡觉。本应上床睡觉的时间，56.8% 的学生在学习。国家规定全国中小學校必须开设体育课，在具体课时上也有明确要求。但实际上，全国超过 1/3 的中小學校的体育课程不能按规定开齐开足。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做的一份调查表明，中国学生最不爱动，只有 8% 的中国初中生会参加课外体育活动，而日本为 65.4%，美国为 62.8%；高中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中国为 10.5%，日本为 34.5%，美国为 53.3%。

为什么中小學生缺乏睡眠、缺乏体育锻炼？主要是课业负担过重。大量重复性的作业，学生不断做题，不断考试，弄得头昏脑涨。许多正在成长发育的孩子黎明即起，深夜方寝，年纪轻轻就得了失眠症，不仅失去了童真的乐趣，也削弱了少年儿童的适应能力、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影响了身心健康。有学校的墙上竟然写着这样的“励志”标语：“人生总要长眠，何必今日多睡。”过去，一个

好的老师对越是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越是重点关心帮助。现在呢，在以升学率为考核标准的教育体制下，只重点培养尖子生、尖子班。智育至上、书本至上、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价值取向，使得学校和家庭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青少年在“做人”的能力和公民素质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有些不堪重负的孩子甚至产生了心理上的扭曲、道德上的沦丧，酿成悲剧。

马国川：现在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背诵记忆，针对考试，反复做题，比拼分数，似乎有了分数就有了一切。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批评说：“家长们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

所以，有不少人士激烈批评说，中国的素质教育完全失败了。尽管这种说法还有待商榷，但是不容否认，作为一个喊了多年的口号，素质教育没有得到落实，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对于应试教育产生的学生课业负担问题，学生反对、父母指责、学校抱怨、教育部三令五申“减负”，却无论如何解决不了，这也是中国教育的一大怪现象。

朱永新：如果说，在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效，那么在高中阶段，应试教育问题就更加严重了。现在很多地方只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搞素质教育，高中阶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对高中生只有一条：只要把功课搞好，其他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近年来还出现了河北省衡水中学这样实行军事化、“无死角管理”的名校：从早上到晚上，学习和作息时间安排具体到分钟，很多学生在跑步锻炼和进餐时间都在拿着书读。此外，成绩、德行、卫生全部纳入“量化管理”，包括“男女生频繁交往”、发呆、吃零食等都属扣分范畴，甚至要在学校通报批评。虽然这所学校有数百名学生考入北大和清华的辉煌成绩，但是它类似监狱式的高压管

理方式遭到了社会的激烈批评。

高压应试教育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剥夺了孩子的童年和青春。一名名校毕业生对此反思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候都浪费了，我在高中三年缺失的东西，使得最后考进名校的结果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应试教育培养出的是“高分低能”和没有“创造性”的学生，而且应试教育借助升入大学的高中生又进入大学。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照样用中学方法来读书和学习：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看笔记，考后全忘记。学生们把分数看得极其重要，一天到晚就是为了分数。他们不会独立读书，缺乏独立思考。就像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钱颖一教授所说：“他们在品格、人生目标、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性精神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与中小学教育的偏颇有很大关系。‘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让学生从小学开始（有些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参加各种‘辅导班’，唯一的目标就是升学。”

马国川：因为对国内的应试教育不满，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日益显著。《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在美就读私立高中人数近些年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2005年至2006年，仅有65名中国中学生前往美国私立高中念书；2012年至2013年，美国私立高中已有23795名中国学生。七年时间，这一数字剧增365倍。

朱永新：留学的低龄化，是人们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否定国内应试教育。

高考弃考、出国读大学的人数也在大幅增长。据统计，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人，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中放弃高考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些年因成绩不够好、担心高考不利而出国读书不同，目前许多应届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名校“尖子生”放弃高考准备留